

中国历史 研究

第5辑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中国历史研究

第五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K207/52

书目文献出版社

版社

编 后 记

本专辑的《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介绍了一种被称为“口述历史”的历史研究体裁，可供史学工作者参考。《殷周金文干支纪日和十干命名的统计》、《天地会文件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等文章，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史料。《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也是近年内大陆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周玉山的文章某些观点与我们不同，但可供我们开阔眼界，了解海外学人对这一课题的看法。

中国历史研究(5)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六号)

河北省南宫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9印张 230千字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 11201·33 定价: 2.30元

[内部发行]

DA52/27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究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蓄意捏造、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D458/31

目 次

论 著

文学与口述历史（讲稿）

唐德刚 一

殷周金文干支纪日和十干命名的统计

周法高 六

古代史

隋代的教育与贡举（上）

高明士 一三

中日史籍中的日使来唐事异同考

戴 禾 1

清代乾隆朝山东巡抚国泰婪索营私案略考

沈景鸿 三〇

天地会文件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莊吉发 四六

近代史

保皇会欧榘甲等组织振华公司骗财谋杀案始末

蒋贵麟 五六

现代史

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周玉山 五八

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

吴相湘 六六

日本军伐造成的南京大屠杀惨剧

杜崇法 八〇

陈诚与沈阳会战

陈家骥 八三

人物传记

明郑卧龙陈永华

曾迺硕 八九

考 古

珠襦玉匣与金缕玉衣

那志良 九六

学术讨论

东三省易帜对全国统一的历史意义

赵中孚主讲 江凤兰整理 一〇八

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摘要与评论

苏云峰 一二〇

海峡两岸史学界应开展民国史档案交流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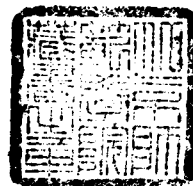
八八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0039

1120039



文學與口述歷史

(講稿)

唐德剛講

編者按：旅美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應中國時報邀請參加時報文學獎評審工作，飛來臺北三日，並於九月十五日晚作「文學與口述歷史」公開演講，演講會由本社發行人劉紹唐主持，唐教授自擬長達三千字演講大綱，惟因時間關係而有甚多省略，現講稿經時報人聞副刊整理完竣，本社特參酌唐教授演講大綱略加補充予以發表，以饗讀者。

唐教授早於一九五七年即參加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部門工作，為該部門僅有的三位工作人員之一。此一工作當時在美國史學界為一大創新與拓荒之舉，故唐教授實為中美史學界搞「口述歷史」工作的元老。在此期間，其個人工作收穫也極為可觀，也是他對我國史學界最了不起的貢獻，即先後完成「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稿)、「(黃沈)亦雲回憶」(譯中文稿為英文)、「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稿)及「顧維鈞回憶錄」(英文稿)等四部鉅著。前兩者中文稿已由本社出版，後者本刊正摘要連載中。

「顧維鈞回憶錄」長達一萬一千餘頁，除顧先生自己所保存之原始文件與資料外，其主要部分(一九一—一九三四)為唐教授所編寫(已故夏連蔭女士編寫童年部分)。從事口述歷史工作往往為「無名英雄」，設非唐教授此次演講提及，編者竟未之前聞，更未向讀者交代，甚感愧疚，謹在此向唐教授表示歉意。

一、導言

我是學歷史的，自小對「文學」也很有興趣，記得有一次在哥倫比亞大學一次「章回小說」討論會上，有一個美國學者列了一堆章回小說書目，大約有四十幾部一百多本，他說：「中國作品實在太多了，誰可能把那麼多的作品看完呢？」我舉手說：「我統統讀過了」，他不相信，反問我說：「你怎麼可能讀那麼多書？」我說我在中學讀書，沒有女同學同我談戀愛，也沒有球可

打，更不會滑冰、跳迪斯可，沒辦法之下，只好看小說了。我對文學大概就止於對這些書的欣賞罷了。所以我只能算是欣賞文學的讀者而已，實在不够資格以行家來談文學，尤其沒有資格談臺灣和香港等名作家的作品。我覺得臺灣近廿年的文學成就遠超過五十年或三十年代的作家，可惜我因為太忙，對臺灣和香港的大批作家的作品看得太少。

其次說到口述歷史，「口述歷史」是我的本行，也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用來吃飯的工作。

「文學」與「口述歷史」我既然都有些關係，現在我就把個人的一點體驗與看法報告一下。首先來談一談「什麼叫口述歷史？」

二、什麼叫「口述歷史」？

我寫過幾本「口述歷史」，加起來可能銷了一百多萬本，而且現在仍繼續出版。而什麼叫口述歷史呢？有人問我：「你的口述歷史是不是胡適先生講，你記，就成了？」「你怎麼能記那麼多呢？」另外，我寫「李宗仁的口述歷史」，他

們也說：「你怎麼寫那麼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歷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記的歷史，而是口述史料。」我替胡適之先生寫口述歷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寫「李宗仁口述歷史」，更麻煩，因為李先生是軍人，他連寫封信都要找秘書，口述時也隨便講講，我必須細心的找資料去編、去寫、去考證，不明白的還要回頭和他再商討。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講的話習慣上就是命令，有疑問反問他時，他都說：「沒錯！沒錯！」我說：「大概有點錯吧！」他立刻又說：「沒錯！沒錯！」我想我以前當兵最高的階級只是個少尉，而他是上將，以一個少尉來指揮上將是很難的，所以我只好慢慢的想法子說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問題反復問他，結果他說：「有書為證，沒問題！沒問題！」於是拿了一大堆書給我，結果都是「稗官野史」一類的書，我說：「你們做司令官的，如果情報不正確的話，像台兒莊等戰役就沒法打勝仗了，我們搞歷史寫文章的也一樣，如果情報不正確也會鬧出笑話來，你剛剛說的這些『情報』雖然有書為證，却也可能是假情報。」他說：「有點道理！有點道理。」費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進入狀況。不過李宗仁的口述歷史，統計起來，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面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的。所以所謂口述歷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寫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學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

非學術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所以口述歷史與一般史料有何不同？大概可以這樣說：口述歷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的，口述歷史可以慢慢談，慢慢問，可以加以補充改正，而其他歷史就不能如此。

在哥倫比亞大學有世界性的口述歷史學部，也有中國的口述歷史學部，但在那裏正式工作的只有夏運驤小姐和我兩個人，夏小姐英文很好，中文不太能寫，只有我中英文都寫，所以那時我所做的中國口述歷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國口述歷史。後來臺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歷史，那是當年我們在美國向胡適之先生建議的。後來胡先生回國，我們給他寫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支持我們成立一個口述歷史的基金會，胡先生回了一封信（見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條）說「臺北中研院也成立了口述歷史。」這就是中研院口述歷史的由來。所以，中研院口述歷史是胡先生寫了那封信才開始的。

接下來談談「口述歷史」的起源，這要從第二次大戰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亞倫·芮文斯（Allan Nevins）自誇「口述歷史」的名詞是他發明的說起。當時他創出的名詞是 Oral History，翻成中文就是「口述歷史」，而現在這個名詞已經世界通行，所以這個名詞事實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亞倫·芮文斯一個人搞起來的。

三、口述歷史的歷史

亞倫·芮文斯提出 Oral History 的名詞

後，但我對他說，你不是口述歷史的老祖宗，而是名詞的發明人。在我看來 Oral History 至少有三千年的歷史，不過那時不叫口述歷史，口述歷史是在中國和外國都有的老傳統。我們學歷史的人一般分歷史為兩大部門：一種是「未記錄的歷史」，英文叫做 Unrecorded History；另一種是「有記錄的歷史」，英文叫做 Recorded History，我們中國有記錄的歷史應該從孔子春秋算起，而孔子春秋却斷自唐堯虞舜，那麼唐堯虞舜的歷史都只是傳聞，也就是口述歷史了。後來的三皇、五帝也都是以口述為憑所上推出來的史前歷史。孔子向來自稱「述而不作」，所以他的作品如「論語」等都是由孔子口述，經學生或學生的學生記下來的，自然也是一部有名的口述歷史了。孔子另外一部可靠的書「禮記檀弓」，記載許多孔子的事，都是孔子口述，弟子所記。諸如此類夫子「述」之，弟子「作」之的作品，就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傳統，也就是「述而不作」的最典型口述歷史。

後來秦始皇焚書，弄得漢初無書可讀，於是找一些學界耆宿如伏勝等加以口述，代代相傳，成了漢代的「今文家」，所以在漢朝四百年間，古文家都不被承認。只有口述而成的今文家才受重視。（事實上「左傳」並非偽書，而是被偽作者劉歆動過手脚。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春秋是孔子讀「魯史」的筆記，有哲學氣味的筆記，也可說是根據儒家思想而整理的筆記。但是「魯史」是什麼樣的書？作者又是誰？我大膽假設：「魯史」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左傳」的原來面目

即是「魯史」，孔子因之作春秋，此書失傳後，被劉歆在「中秘書」發現，乃改頭換面，倒果為因，搞出左氏傳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四、口述歷史在中國史學上的實例

另外劉漢以後也有很突出的口述歷史，那就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列傳七十篇（再大膽假設一下）可能有一半是他道聽塗說的，要不然就是 Interview 他人所聽來的，也就是根據「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編寫而成的。最好的例子是「刺客列傳」——荆軻刺秦王那一段，他說得很明顯，現在抄錄下來看看：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從以上所錄看來，司馬遷認為他的故事比傳聞更為正確，因為他是聽「公孫季功」和「董生」說的。而公孫和董又是直接聽夏無且大夫說的，而夏是秦始皇的私人醫生，當暗殺進行之時，夏醫生幫着老板用「藥囊」打過荆軻的，其話當然可信。這是一篇極好的文學著作和歷史，而司馬遷就講明他所用的是「口述史料」，其他未講的正不知有多少？

由此看來，「口述歷史」（也可以說是「口述文學」）在中國至少有兩千年的歷史了。

再看我們安徽出的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幼年時做過叫化子，也當過和尚，他年老時最忌諱這一段，那時有位士子上表歌功頌德說朱元璋的

功業蔽天「光被四表」，誰知馬屁拍在馬腳上，朱元璋認為「光被四表」是嘲笑他幼年當和尚，和尚頭「光被四表」，所以把這馬屁精給宰了。

可是等到老朱老了，要蓋祖廟、修族譜時，對自己的身世，總得有個交代啊！但是那些搖筆桿子的什麼「大學士」們，誰敢執筆呢？他們想來想去，想出一個聰明辦法來——來搞個「口述歷史」，說聖祖神宗，對聖上祖宗盛德，才難盡述，伏乞聖主略敘列祖列宗之天縱英明事跡，愚臣庶可據以跪錄，等等。誰知朱元璋倒也大度，他就真把他過去當和尚、作叫化子的往事，毫無隱諱地全盤托出。這篇文章也是中國口述歷史和口述文學上的傑作，沒有口述歷史這個傳統，這篇文章是無法執筆的。（原文見「七修類稿」）

另外如太平天國覆滅時，忠王李秀成的「供辭」（口供）也是我國傳統「口述歷史」的上品。據說當忠王李秀成被曾國藩抓了，忠王用廣西話口供，曾國藩聽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寫，於是李秀成一面講一面寫，完成了這篇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忠王李秀成供狀。

大陸上最好的、最出色的一本口述歷史的書，是老舍寫清末代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把他老婆一妻一妾裝模作樣的種種情形寫得非常真切動人，所以大陸上三十多年來歷史成就，當推老舍這本口述歷史。

從以上這麼多例證我們可以明白，「口述歷史」這個名詞還沒有到中國之前，我們早就有「口述歷史」的事實了。

五、西洋傳統史學中的口述歷史

在西方，從古希臘古羅馬的荷馬（Homer 公元前九世紀）和霍羅都托（Herodotus，公元前五世紀）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歷史」，甚而蘇格拉底、釋迦、耶穌、摩西……等的言論也是口述後記錄下來的。荷馬是位瞎子，他的史料如「木馬兵」等等，幾乎全是「聽」來的。霍氏的故事，很多也得自「傳聞」——人家告訴他的「口述歷史」。然而，西方傳統「口述歷史」中我們有直接關係和影響的，那就是「馬可李羅遊記」了，這是一部「口述歷史」的千載奇書，我想藉此機會介紹一下。

馬可李羅（Marco Polo, 1254-1324）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在他十七歲那年（一二七一），他隨父親和一位叔父啟程去中國，那是他的處女行，但却是他父親和叔父的第二次。他們循古絲綢之路東行，路經波斯、葱嶺，入中國新疆、甘肅，經敦煌過西安（那條唐三藏取經的路），吃盡千辛萬苦，歷時三年，才到達中國元代的大都（北京），向元世祖忽必烈報到。其後他們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國一住十七年，備受寵遇。並以色目要員的身份，由忽必烈差遣，周遊中國，並參加火箭攻克襄陽的激戰。小馬可且自炫曾為揚州太守（位同今日的上海市長）。那時的中國是世界的主宰，生活水準遠過歐洲甚多。李羅三人進入中國，直如板兒進入大觀園，中國貧農到了巴黎，目不暇接。一住十七年之後，忽必烈年老李羅等自己亦倦鳥思歸，衣錦還鄉。此時正值蒙古帝國的欽察汗的可汗（駐波斯）喪偶，北京忽必烈擬送一貴女子去波斯為欽察汗續絃，三位李羅乃膺命護送。他們於一二九二年自北京動身，取水道經泉州、新加坡，穿印度洋，趕往今日炮

火連天的伊朗。護衛六百人，巨舶十餘艘，在三位李羅率領之下，歷時三年，始完成任務。因順路還鄉，回到威尼斯故里。他們一行離開故鄉，前後已二十五年，鄉音無改而人事全非，然李羅三人畢竟衣錦榮歸，光耀故里。

馬可李羅這趟亞洲之旅，在中古時期是不可思議的，他的故事之能震動人心，自不在話下。意大利那時小城邦林立，人民目光如豆，李羅等自大元帝國歸來，自然一開口便以「百萬」為單位（Milmione）。百萬也就成了馬可的渾名。孰知馬百萬還鄉不久，就碰上威尼斯和熱那亞（Genoa）兩個城邦之間的戰爭。馬百萬那時不過四十開外，一戰被俘，便做了熱那亞的戰俘，囚於戰俘營。恰好事有巧合，他同囚難友却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名叫魯斯特企羅（Rustichello），一個善吹，一個善寫，二人一拍即合，在戰俘大牢之內，他倆就擬定一個「口述歷史」計劃，寫起書來，二人所說的都是當時當地通行的意大利法語（France-Italian），書成之後，他們就以「百萬」作書名。後來譯成其他語言就改稱「馬可李羅遊記」了。

「百萬」書成於印刷術傳入歐洲之前，但初稿方出，立刻便勢如野火，傳抄、翻譯，很快便傳遍歐洲，其後各種不同的抄本，竟多至一百四十餘種。由此可見「馬可李羅遊記」實是我輩搞「口述歷史」這一行中，影響最大的一部世界名著。事實上，後來名震世界的熱那亞晚輩冒險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到美洲去探險，就是根據馬氏遊記想到東方找中國，結果找錯了反而發現美洲。「口述歷史」意外地發生了這麼大的功效，這是馬可李羅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六、口述歷史與文學

我們談口述歷史與文學，應先擴大來談「文學與歷史」，才能釐清它們兩者的關係。我本來學歷史，但對文學有興趣，所以我編了十六字真言來涵蓋文學與歷史。那就是「六經皆史」、「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十六個字。

先說「六經皆史」，這是清章學誠說的（其實西方也有二經皆史，指新約全書、舊約全書），他認為不只六經，其實諸子百家皆史，我倒認為不只諸子百家皆史，甚至小說如「封神榜」、「西遊記」、「鏡花緣」、「金瓶梅」皆有其歷史價值。其次「諸史皆文」，譬如司馬遷的史記就是一部文學，所謂「文章西漢兩司馬」，司馬遷的歷史散文早被公認是上等的文學作品。我們讀西洋史也一樣，可以見到許多很好的歷史文學。譬如「邱吉爾回憶錄」曾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定有它特別好的地方，我讀這本書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有一次邱吉爾與希特勒約期見面，由於邱吉爾講話不小心，批評希特勒，希大為生氣，取消了約會，從此以後，邱與希再也沒有見過面。這件事如果由我們來寫，可能秉筆直書「邱吉爾某年某月某日，應與希特勒在某處碰頭，後來希特勒取消約會，所以兩人一直未曾相見。」但「邱吉爾回憶錄」却是這樣寫的：「希特勒自此以後就失去見到我的機會了！」（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這個事實和「自此以後我們兩個都沒有見過面」沒有兩樣，但在「邱吉爾回憶錄」中的筆調却一直強調 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 比一般人的寫法精彩多了，這也就是

把歷史作品的文學性加強以後，可讀性增加了。古代歷史中，後漢書有十幾家，為什麼後人獨推范曄的後漢書，其他都不傳，這並不表示其他後漢書歷史寫不好，而是文章沒有范曄的好，所以也可以說百家皆史、良史皆文。

最後說「文史不分」「史以文傳」，從中西古代歷史來看，都是因為它是好文學所以才傳下來，因為古代沒有很好的印刷術，光靠手抄，所以只有好文章才會被抄下來。但是這種「文史不分」「史以文傳」的傳統現在已漸漸衰微，就以寫中國歷史的作品來看，美國人大都老老實實平鋪直敘，但英國人寫歷史就注重文學修養，他們寫史第一條件要英文寫得好。與美國並不要求英文寫得好，只要求正確與否不一樣。我的同事中英文文好的都是英國人，這是歐洲老傳統與美國商業社會對歷史態度的不同，現在美國新歷史學家很少有新氣味，所以他們的東西把它當歷史看可以，當資料看也可以，但是，要當文學看就差多了。

七、現代史學

這種美國式的歷史趨勢，愈來愈可怕，也就是說歷史漸漸被科學所污染，在美國歷史現在叫做 Social science approach，完全看成一種社會科學，如此一來歷史就變成乾燥無味的東西了。例如我執教過的紐約市立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就是把歷史劃入社會科學院和政治學院，我在哥大曾向院長建議，歷史應在文學院而不應在社會科學院，像我們中國的各大學，歷史系都在文學院的，但我的建議並沒有被採納。西方的歷史學除了歸入社會科學愈來愈怕燥

而外，最糟的是電腦普遍應用以後，歷史已被電腦征服。今天早上我看 China Post，有一篇文章說中國大陸在大躍進期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在中國大陸餓死了二千七百萬，這件事，我在一九八一年到大陸，我的朋友親戚學生都知道死了那麼多人的事實，但我回到美國後，跟朋友講竟沒有人相信，他們問 How do you know? 說我信口開河，說我反共應有分寸，我被說得啞口無言。但這個事實今天報紙就登出來了，清清楚楚寫着死了二千七百萬。他們根據什麼知道死了這麼多人呢？報上說，他們是根據電腦，中國大陸一九五八年人口調查及一九六四年人口調查的結果，以生長滅亡規律算出非正常死亡的有二千七百萬，這個數字是美國學者到北京開世界人口會議所提出的結果。中共與會的三位學者一句話都不說，有一位說：「你講得太多了吧？恐怕只有一千多萬。」而今天美國學者為什麼敢肯定地說餓死二千七百萬，因為這些資料的獲得有科學的根據，這也就是歷史科學化的結果，只要電腦一按，歷史資料就全部出來了。

電腦的應用改變了整個學術界的狀況，我在美國卅年來老跟着電腦跑，常有跟不上感覺。我想再過一百年，歷史研究會變得不可思議。那時，我們回頭看胡適、余英時等歷史學者，也再看看自己，一個個都變成不堪一看的冬烘先生。將來什麼事都根據電腦，學者的努力將會是白費心機，譬如胡適用了十多年時間研究詩經，將來一按電腦，嘩啦啦什麼都出來了，結果胡適搞了十幾年，電腦幾秒鐘就出來了。這種歷史研究趨勢，受科技發展的洶湧來勢影響，將會一發不可收拾。上次參加在美國舉行的「辛亥革命會議」

，大陸一個學者寫信給我說大陸上看不到臺灣、日本、美國的資料，問我能否幫他蒐集一些辛亥革命資料，我想我這麼忙怎麼幫他呢？於是我到圖書館請教管理員，向他索一些辛亥革命資料，要他告訴我 Computer 怎麼做法？他說好，你給我一個題目，於是給我「中國辛亥革命」，他說我告訴你怎麼做，首先找到「革命」，一按鈕「革命」的資料嘩啦啦立刻又顯印出來了。其次「中國」，於是「中國革命」的資料立刻又顯印出來。再按一九一一年，又嘩嘩嘩大約三十秒鐘就印出了一大堆「中國辛亥革命」的資料，這些資料如果自己來抄，至少要兩三個月才能抄完，我日常工作很忙，怎麼可能有兩三個月的工夫去幫助朋友查抄這些資料呢！但用電腦我查抄這些資料給他，只花了卅秒。所以我說電腦是很可怕的。

在電腦科技的發展下，人的生命將逐漸失去了意義，試想卅秒可以得到的東西，還要胡適這些大家做什麼？我們學歷史的還有什麼用？學歷史的要靠什麼吃飯？不過，事實上並非如此悲觀，因為歷史中還有部分可以和科技抗戰到底的，有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煉的，那就是歷史之中，還有文學。

八、口述歷史與文學的展望

歷史雖然被科學瓜分了，幸好歷史中還有文學的一部分，使我們有飯吃，有興趣繼續搞下去。然而，我並不是說科學不重要，如果科學不重要，我們就無法知道中共大躍進死了二千七百萬，這完全靠科學。所以歷史雖然向科學靠攏，但沒有科學也沒有歷史，而歷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學，那麼歷史就要自殺了，學歷史的人他的人生也沒有意義了。所以現階段歷史中還有口述部分

是很有生命的，我寫了不少口述歷史的東西，盡量使這些書的可讀性提高。當年我為顧維鈞先生編寫回憶錄，他與我談了許多外交上的軼事，我請他盡量詳細的講，尤其他當袁世凱秘書時所知道的一些逸事，顧先生起先不肯講，經我再三追問才勉強講出來，結果後來發現都是很有味道的歷史文學。這一類的口述歷史是保存文學成分較多的歷史，不是數目字也不是科學，將來可讀性之高一定超過一般歷史，因為看歷史的人並非都是史學專家，多數只為了得一點歷史知識而去閱讀，如果沒有可讀性就沒有人看了。我想凡是够資格做口述歷史的人，都有幾分文學的素養，而且凡是够資格寫的人都會講，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有德就是有技術（寫史的技術）。我與胡適先生談，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可惜我沒那麼多時間去搞。胡適、顧維鈞、黃沈亦雲（黃郭夫人）都很會講，所以他們的回憶都很有可讀性。因此，十幾年前我回臺灣，想到曾兼任過中央大學校長的老總統，如果可以請到他老人家做個口述歷史，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沒有如願，總統就過世了，我一直很難過，這麼好的口述歷史竟沒有傳下來！

如今學歷史的百分之八十向科技投降，我也投降了百分之七八十，還好有百分之二十，我們可以抗戰到底。所以寫歷史必須用文學來寫，並與新聞合作（新聞是當前的歷史），才能把未被科學征服的百分之二十保存下來。現在搞口述歷史要像桃園三結義一樣，把歷史、文學、新聞三位結成一體變成劉、關、張三兄弟，就可以寫成很好的歷史了。

（原載：傳記文學（台）一九八四年四五卷四期一〇——一五頁）

殷周金文中干支紀日和十干命名的統計

周法高

近讀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民國七十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一書，收集他二十年之間(一九六二—一九八一)發表的十三篇關於中國青銅時代的論文，得益不少。其中第七篇「商王廟號新考」(一九六三)、第八篇「談王亥與伊尹的祭日並再論殷商王制」(一九七三)、第九篇「殷禮中的二分現象」(一九六七)，討論到殷代的王位繼承制度。他在第一篇「中國青銅時代」(一九八〇)說：

依據近來對夏商王制的研究，三代(除了周代後期以外)的王位繼承制度可能是在內婚王族之內若干產生繼承人的單位之間輪流繼承的，而這些單位分為兩個主要的單元。在王室的祖廟裏，這種兩元制度便反映為周代文獻中所記載的所謂昭穆制度——昭級的祖先排在中央的太祖左邊(即東邊)的昭廟裏，而穆級的祖先放入右邊的穆廟裏。在這裏應特別提明一下的是這種輪襲的說法只是祖廟昭穆制的可能解釋之一，而研究古代中國的學者在這方面的看法並不一致。(二二——二三頁)

可見他的這個說法雖然很新穎，但是還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公認。我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新的意見，不過我對於他在第八篇中的小統計也發生了一點興趣。該文說：

在我與幾位同好所搜集的一批四千多件有銘文的商周青銅器圖錄裏，其中有個「干」(甲、乙……)或「親干」(父甲、母乙……)的銘文的有一二九五件。自考古圖、博古圖以來，講金文的人都援商王的名字為例，解釋金文裏的「父甲」為某人生在甲日之父，亦即個人的廟號。這一二九五件銅器，依照這種說法，乃是代表了一二九五件銅器的人死去的親人，卻不能說代表一二九五個人，因為有些成組的銅器，應當是做給同一個人的。但這種數目上的差欠情形，在十干的比例數上所引起的影響應當是一樣的。十干在這一二九五件銅器的分佈如下：

甲：三〇件
乙：二七四件
丙：二一一件
丁：二七〇件
戊：五五件

己：一七八件
庚：四一件
辛：二〇九件
壬：一四件
癸：二〇三件

這種分佈情形，是生日說法不能解釋的。這一千多件銅器，照著錄的人估計，屬於商的有一一〇二件，西周的有一九一件，不明的有二件。西周的一九一件中能略定在成康以後的只有一九件。(二〇五——二〇六頁)

我因此也起了一個念頭，想把我所編的金文詁林(一九七四——一九七五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一書中所收的三一六七號銅器銘文(約四千字左右，因一號下可能有數器)中十干出現的次數加以統計。大致分日名和人名兩項。日名方面六十干支的分配如下：

甲子二 乙丑三 丙寅三 丁卯一 戊辰二 己巳〇 庚午一 辛未二 壬申三 癸酉一
甲戌一 乙亥一 丙子〇 丁丑四 戊寅八 己卯一 庚辰〇 辛巳五 壬午六 癸未六
甲申一 乙酉四 丙戌一 丁亥六 戊子〇 己丑五 庚寅一 辛卯五 壬辰二 癸巳四
甲午八 乙未五 丙申二 丁酉四 戊戌三 己亥五 庚子〇 辛丑一 壬寅二 癸卯一
甲辰〇 乙巳四 丙午六 丁未三 戊申一 己酉三 庚戌二 辛亥五 壬子〇 癸丑〇
甲寅六 乙卯八 丙辰一 丁巳六 戊午〇 己未一 庚申五 辛酉四 壬戌一 癸亥〇

總計：甲四〇 乙三八 丙一三 丁九 戊一四 己一五 庚四二 辛二二 壬一四 癸一二，共三〇三。

由上表可見六十千支在金文中出現並不是有均等機會的，可能某些千支在當時認為是比較吉祥的，例如丁亥出現的次數最多，達六十五次，約佔六十千支總數的五分之一。其次是庚寅出現十九次，是屈原誕生的一個千支。千支大部份出現在周代。

關於人名方面，用十千為名的大部份出現在殷代或西周初年。其中在十千前加「父」字的最多，現在按十千的次序列在下面，凡只用一個天干而不用複詞代表人的不錄，因為無法決定是否代表人的緣故。

一、甲：父甲二三，母甲一，（祖）甲二，甲晏一，甲考一，共二八。

二、乙：父乙一八八，母乙一，妣乙一，祖乙二三，文父乙二，文考乙公六，文考父乙一，文考乙伯一，文考乙仲一，日乙一，文父日乙一，文考日乙一，大兄日乙一，祖日乙二，父日乙二，大子乙一，季日乙一，仲子日乙一，乙父二，乙公一，乙考一，乙伯一，武乙一，共二四一。

三、丙：父丙一九，祖丙四，文考父丙一，兄日丙一，亞丙一，共二六。

四、丁：父丁一六三，母丁一，妣丁一，祖丁二六，兄丁一，文父丁六，文考父丁一，文考日丁二，文父日丁一，皇祖日丁一，祖日丁二，大子丁一，丁公三，皇祖丁公二，丁侯二，丁師一，伯丁父一，康丁一，共二一六。（六八六號，三代五、一三「弔（叔）父丁高」，「叔」為作器者之名，並非「叔父」連文，故併入「父丁」項下統計。）

五、戊：父戊四七，考戊一，母戊二，妣戊一，祖戊八，兄戊一，戊父二，日戊二，兄日戊一，文父戊一，史戊一，共六七。

六、己：父己九九，妣己一，祖己一五，兄己一，文父己一，日己一，父日己一，公日己一，祖日己二，大祖日己二，文考日己一，文考己仲一，羊己二，共一二八。

七、庚：父庚三〇，母庚一，祖庚二，宗庚一，女庚一，皇祖考庚一，考日庚一，祖日庚二，文考庚仲一，庚姬二，庚姜一，庚羸四，孟庚一，庚宮一，共四九。

八、辛：父辛一一八，母辛九，妣辛二，祖辛一八，兄辛一，子辛一，女辛一，大父辛一，文父辛一，文考父辛一，日辛四，父日辛一，兄日辛二，文考日辛二，公日辛一，辛公一，辛伯二，辛仲一，孟辛父一，仲辛父一，辛宮二，共一七一。

九、壬：父壬一〇，母壬一，祖壬一，日壬一，兄日壬三，子東壬一，共一七。

十、癸：父癸一二七，母癸六，妣癸二，祖癸一二，兄癸一，子癸一，文父癸一，文考癸二，日癸三，父日癸一，兄日癸一，皇考日癸一，文考日癸一，大父日癸二，文姑日癸二，癸父一，共一六四。

從以上的統計，可以看出十千命名出現的並不平衡，現在把總數列於下方：

命名：甲二八，乙二四一，丙二六，丁二一六，戊六七，己一二二

千支：甲四〇，乙三八，丙一三，丁九三，戊一四，己一五，庚

四二，辛二二，壬一四，癸一二，共三〇三。

張文：甲三〇，乙二七四，丙二一，丁二七〇，戊五五，己一七

八，庚四一，辛二〇九，壬一四，癸二〇三，共二一九五。

張文以一件銅器為一個單位，凡一器中一個天干出現數次，只算一次；又把千支和天干命名以及其他合在一起計算。而我則把千支和天干命名分別計算，凡一個天干不出現在複詞中的，無論是否人名都不計算，以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實際上金文詁林中天干命名的例子應該比我所統計的要多一些。至於天干出現的總數還要更多一點，因為其他的一些用法都沒有包括進去。張文所根據的四千多器，以有圖形為限，多為殷器，往往銘文很短，遠不如金文詁林所收的總字數為多。不過十千命名大部份是早期的金文，所以二者的代表性也差不到哪裏去。

以上的統計，是我第一次利用金文詁林的資料所作。雖然不見得有什麼決定性的結果，但是也很有意思。

「商王廟號新考」說：

(一)廟號雖以十千為名，但各千在殷王世系中出現的次數不一。以殷本紀為據：名甲的有七、名乙的有六、名丁的有八；上甲以後三十七個商王之中，甲、乙、丁三個日名占了二十一個，在半數以上。其餘十六王之中，名丙的有二、名戊的一、名己的一、名庚的四、名辛的四、名壬的三、名癸的一。故十千之中的五個（甲、乙、丁、庚、辛）占了三十七王中的二十九，幾達六分之五。這是無論生日說或死日說都難以解釋的：何以殷王六分之五都生或死在一旬的甲乙丁庚辛五日？

(二)甲乙丁三個千，不但占商王廟號半數以上，而且在商王世系表上作極規則性的出現。（一六一頁）

後來提出他的分組說：

先王廟號可以分為兩組：

A組：甲、乙、戊、己；嗣後稱為甲乙組（直系皆甲、乙）

B組：丙、丁、壬、癸；嗣後稱為丁組（直系皆丁、僅一例外）

此外，庚、辛之分組暫不決定，或稱之為第三組。以上的分組，照A—B歷世次順序輪流出現這一條規律而言，在商王世系中，可以說是沒有例外的。由此，我們發現商王世系廟號所透露的一個大原則：及位諸王隔世代有相同性；易言之，兄弟與祖孫屬於同祖，而父子屬於異組。（一七五頁）

張文的新發現，前所未有，至於他用王室內婚制來解釋，還沒有得到大家的公認，但尚能自圓其說。根據我統計金文十千命名的結果，以甲為名的很少，只有二十八次，約佔總數的四十分之一弱，和殷王以甲為名的比例在三十七王中佔了七個，約佔總數五分之一強，相差懸殊。假使我們相信張文的解釋，我們不妨假定：從祖甲以後，甲組漸趨式微，所以下兩代武乙和帝乙都是以乙為名的。我們再看：以乙為名的佔二四一次，以丁為名的二一六次還要多，似乎可以看出甲組和乙組的消長關係了。金文屬於殷代的，大部份是殷代晚期的作品，似乎和我的解釋並不衝突。以壬為名的佔十七次為最少，約佔總數的六十五分之一，和殷王中以壬為名的有三人比例不合，可是以壬為名的殷王都是盤庚遷殷以前的，大概在殷末也只佔極少數吧！殷代

金文中以癸命名的有一六四次，而殷王中名癸的只有一個，在盤庚以後一個也沒有。我相信能夠鑄銅器的都是貴族，和王位繼承多少有一點關係。無論如何，張文對殷人以十千為名是生日或死日的說法都有駁斥的功用，至於其解釋是否正確，則不是我所能決定的了。

關於昭穆之制，張光直「商王廟號新考」，（中國青銅時代一八七—九頁論「昭穆制問題」）以為與殷人甲乙組與丁組輪流為王之制相合。該文「校後記」前引書一九四—五頁）：

不特宋齊之制與殷人相似，宗周亦不例外。殷制以甲日祭甲，乙日祭乙，上文已說明清楚。西周之祭禘先祖，因無卜辭為證，其祭曆頗乏材料可循。下舉諸條，或不無發明的作用：

今彝：丁亥今天告于周公宮（周公為昭世）

荆鼎：丁卯王帝……邵王（邵王世次見下）

春秋文公二年：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八月，丁卯，大

事于大廟，躋僖公。（僖公自周公向下推為昭世）

天亡簋：乙亥……殷祀於王丕顯考文王（文王為穆）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莊公為僖公父，穆世）

是西周及東周初年王公祭祖先的日子，好像也有一定，而以乙丁二日為多，好像乙日祭穆世的祖，丁日祭昭世的祖。加上上文所述齊太公以下先丁公（昭）後乙公（穆）的次序，豈不是丁即是昭，乙即是穆，而乙丁制與昭穆制實一制之兩名麼？可惜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第一，要使魯僖公為昭世，非得以周公為昭不可。周公是文王子，武王是兄弟，在宗周而言，是屬於昭世。但周公封於魯以後是為魯之太祖，還是魯的宗廟在昭穆之次是自文王一直排下來的？這個問題不解決以前，我們就不能斷言僖公是昭。齊太公為太祖，其子丁公才是昭，丁公子乙公才是穆。固然齊魯一是異姓，一是同姓，其宗廟中昭穆之序未必是依一個原則開始的。但是我們還得提出些有力的證據。魯莊公的昭穆世次，與此相連。第二，天亡簋銘文一開首的乙字，在原文中看不出來，是金文家依後文補的。其三、今彝中

除了丁日「告」周公以外，還有甲日用牲于京宮，乙日用牲于康宮的記錄。京宮康宮的問題，還有些待研究之處，見唐蘭的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一九六二（一）一文。依唐蘭，康宮為康王之宮，康王為古公以下第五世，有太祖的地位，故康王以後的昭王是昭世而穆王是穆世。依此說則刺鼎中的邵王是昭世，與丁是昭之說合。但依此說，則魯莊公僖公的世次又得重新排過。我們不能因邵王為丁日祭，採唐蘭使邵王為昭世，而魯僖公為丁日祭，則不採唐說，自文王一直昭穆昭穆向下排也。正如西諺所云：You can't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事實上，唐蘭用卿大夫的宗法制解周天子的世系，以湊合他的康宮說法，是否成立，尚未可知。因此，上舉諸例中最大的問題在於丁卯日啻邵王一條。或

① 周公旦—伯禽—考公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刺鼎之邵王為某一昭世之王，未必即指昭王而言？總之，周之昭穆與殷之丁乙顯然有密切的關係，但確實的連繫，還待進一步的研究。

按天亡蓋現藏大陸之故宮博物院，拓本雖第一字不清楚，然未聞有提出異議者，則釋為「乙」尚無可資懷疑之處。參故宮博物院刊第二期五二頁張克忠跋蓋，一九八〇；孫稚離「天亡蓋銘文滙釋」（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六六—一八〇頁）說：

首字原泐。孫詒讓「以下文丁丑推之，此疑當為乙亥。」（古籀餘論）丁丑前二日為乙亥，據補。（一六九頁）

所補，也合乎文王是穆的記載和張文對「乙」的涵義的解釋。

關於魯國的昭穆問題，先根據史記魯世家的記載排列其世系如下（隱公以下據左傳）：

春秋經閔公二年：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可見莊公爲穆，僖公爲昭，合乎張文的假定。可見周公旦在西周王室和魯國都算是昭；另一方面，如果周昭王也算是昭的話，就只有採用唐蘭的說法把康王不算在內。這樣就和古書中所說相抵觸正如張文所考慮者。不過如果只據現在看到的這幾條材料而言，可能魯國就把周公當作昭、伯禽當作穆。至於真象如何，那還得再等新材料的發現了。

張光直「商史新料三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四分，一九七九說）：

西周微史家族的系譜中有不少日名，而其世代間的分佈現象，與商王系譜中十干歷代分佈的現象，可說完全相同。

乙祖——祖辛——乙公——丁公（微）
武乙——文武丁——帝乙——帝辛（商）（七五二頁）

這一條證據是對張說有利的。

金文中有一條和張說相抵觸的，那就是「我方鼎」。容庚善齋彝器圖錄四五「我方鼎」銘文云：

唯十月又一月丁亥，我作禦宗且（祖）乙乙（妣）乙、且（祖）己乙（妣）癸，征約叔，二女咸與。違榑于奉見五朋，用作父己寶尊彝，若（亞形中）。

容氏云：

甲骨文「十一月」、「十二月」作「十月又一」、「十月又二」。「彝簋」在十月一，即「在十一月」也。餘尊「唯王十祀又五」，即「唯王十五祀」也。此言十一月作「十月又一月」，復略異。至于周金則作「十又一月」，「十又二月」矣。周人多以丁亥日作器，所見始此。禦叔等皆祭名。榑又見于毓祖丁酉（小四·五九），云：「辛亥，王在虞，降令曰，歸榑于我多高處山，錫釐，用作毓祖丁尊。」

著錄：善三·卅九作獻，貞補上十三乃器，貞續中四作蓋乃蓋，雙下一·四，小三·九八作獻，續殷上二五蓋器全（註

三）。

赤塚忠「稿本殷金文考釋」八六頁第三〇號第五一器「亞若我鼎（註四）」，白川靜金文通釋（白鶴美術館誌第四輯一八五頁）作「征鼎」，可見容、赤塚以爲殷器，而白川以爲周器，且謂容庚氏以爲器屬周初，恐怕是誤解了容氏原意吧！銘文中「祖乙妣乙」，配偶的天干相同，是一特例，和張說相抵觸，至於「祖己妣癸」，大概和「祖乙妣乙」是平輩，乃叔祖父母，根據張說，「乙」和「己」同屬一組；「癸」則屬另一組。如果殷代同名乙的血緣很接近，那麼「祖乙妣乙」是不應該有的現象。除非「妣乙」的「乙」是錯字，才合乎張說。

後記

近讀姚孝遂「禦鼎辨偽」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二三—二八頁，一九八三年二月一文云：

「三代」四、二一、一曾著錄有禦鼎；十、四三、二又著錄有禦簋。乍看起來，二器似乎同銘，而實際上兩者却有差別。

根據種種迹象看來，所謂禦鼎的銘文，可以肯定是偽作的。至於器身是否爲偽，由於未見到原器（現在台灣），不敢斷言。所謂器蓋，即「三代」所著錄之「禦簋」，其銘文大概是真的。由於此器已不知去向，也不敢斷言是否即禦鼎之蓋（「尊古」與「善圖」即認爲是同一器與蓋）。但有一點是可以斷言的：禦鼎的銘文乃是仿禦簋而偽作。（頁二五）

以下該文列舉數項理由：

- 一、字體風格的不一致。
- 二、字體結構的錯誤。
- 三、器與銘不統一。
- 四、祖、妣同名。

關於第四項，該文云：

商、周時期銘刻，所見祖、妣以天干爲廟號者，夫、婦絕無同

名之例。張光直先生在其「商王廟號新考」一文中已涉及到這一點（見民族研究所集刊一九六三年，第十五期）。

以天干為廟號，是商族的習俗。祖、妣的廟號，不可能相同，這是商、周銘刻所已經反映的，無可懷疑的事實，是大家所不能加以否認的。至於這種現象究竟應該怎樣加以解釋，目前各家的意見分歧很大。這屬於另外一個問題，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不過我們願意在這裏提出我們的一個傾向性意見，即：這種廟號制度是與商族的婚姻制度、繼承制度有密切相關的。（頁二八）

我把該文引用在這裏，一方面因為和拙文所提到的禦鼎有關，一方面想請教故宮博物院研究銅器的專家，對於禦鼎銘文的真偽問題提出寶貴的意見來。

關於唐蘭對金文中「康宮」的解釋，近讀陳佩芬「繁白、趙鼎及梁其鐘銘文詮釋」（上海博物館集刊一九八二年，一五—二五頁）一文云：

以前唐蘭先生作「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一文詳細地考證康宮是康王之廟，他說：「我們可以看出見京宮裏是五廟，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和成王，是一個始祖和二昭二穆，但康王以後忽然改了，變為昭王是昭，穆王是穆了。這就證明了康王的廟必然是獨立的，不在『京宮』以內的，證明了康王在周王廟的宗廟裏是作為始祖的。」為甚麼自康王開始要改變宗廟昭穆的制度，這裏既沒有理由，也缺乏根據，大宗之廟的昭穆制度忽然改變，那末在這一體系之內分封的「管、蔡、鄭、鄘、霍、魯、衛、毛、聃、邴、雍、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小宗，其別子將如何立昭穆而與所謂康王變化了的宗周廟制相適應。「宋史·禮志」載何詢直云：「古者葬祔以其班，祔以其班，為尸及賜爵以其班，故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廟次雖遷，昭穆之班，一定不移。」其說甚辨。康王開始

忽然改變昭穆的推測，這個說法有着不可克服的內在困難，而很不容易使人相信。說康宮之祀康王為始祖，其實是由於在排列上出現了昭王和穆王的緣故，把昭王和穆王作為宗廟的昭穆，於是康王就成了始祖。昭王和穆王（或稱穆穆王）都是生稱，他們的王名與宗廟的班次不應有任何聯繫。不可能把宗廟祭祀的位次先作為王者身前的王名而預先訂好位置，不作為廟主班次名稱的昭和穆，都是美好的稱謂，作為王名，只是與作為廟主位次之名的「昭穆」偶合而已。而且據金文，穆王本稱穆穆王，稱穆王是省稱，因此昭穆之稱與宗廟位置毫無關係。唐先生批評朱熹的「周九廟圖」一把康王排成「昭」，昭王反而排為「穆」，而穆王反而排為「昭」了，這種排法，顯然是很可笑的。「這個批評是忽視宗廟的昭穆制度是不能改的，左右不能相易，因此是不適當的。」

按古代天子以受命之君為始祖，諸侯以始封之君為始祖，據此原則，查「史記·晉世家」晉穆侯是昭，晉昭侯也是昭。「齊世家」的昭公是穆而不是昭。國君不論是生稱或諡號，在史書上凡稱昭穆，都與宗廟的班次無關。因此康宮是康王之宮的說法，實不足取。（一七一—一八頁）

該文的意見可供參考。

註釋

（註一）據白川靜金文通釋（白鶴美術館誌第五三輯，一九八一）「本文篇」卷一上—卷三下西周金文部份，十千命名的次數如下：

甲四，乙五二，丙一，丁三一，戊一二，己一二，庚七，辛二五，壬一，癸二六，共一七一。

可見周代以十千為名的比起金文詰林中殷周合計一一〇六次要少得多了。

（註二）表中阿拉伯數字為魯君次序，中文數字表示第幾代，單數為昭，雙數為穆。哀公以後從略。

(註

三)

「善」劉體智「善齋吉金錄」，「三·卅九」，「三」當作「二」，白川靜「金文通釋」，「孫稚雅」金文著錄簡目「一五五號皆沿容氏之誤，拙撰「三代吉金文存著錄表」四·二一·「黎鼎」下已改正。「貞補」、「貞續」、「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續編」。

「雙」于省吾「雙劍謠吉金文選」。

「小」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

「續殷」王辰「續殷文存」。其餘各書可參拙撰「三代吉文存著錄表」(台北三民書局、學生書局經售)

(註

四)

「稿本殷金文考釋」原書為謄寫版，有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九)自序。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赤塚忠「中國古代の宗教と文化——殷王朝の祭祀——」(東京角川書店出版)一書中七二二——八六五頁即為「殷金文考釋」(排印本)。白川靜「金文通釋」第四輯出版於昭和三十三年(一九六三)，但因赤塚書中器名不同而漏引。作此器者為「我」，其族徽為「亞中若」。白川氏稱為「征鼎」，按「征」不是作器者之名，可能是發語詞，在詩經、書經裏作「誕」。我在「康侯殷考釋後記」(大陸雜誌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二頁—三頁，一九八〇)有所說明，在該文中引到「征盤」(三代六·三七·二)，排印時有誤作「延」的，就是這個字。

(原載：大陸雜誌(台)一九八四年六八卷六期 一—七頁)



隋代的教育與貢舉（上）

高明士

序言——問題所在

隋代前後總共三十七年（五八一—六一七年），是一個短命王朝，有類於秦朝。論及教育，若以學校教育為代表，相關資料遺存甚少，因此，在一般教育史的著作裏，對於隋代教育的處理，常不及一篇篇幅（註一）。論及貢舉，輒以進士科之創設作為貢舉之起源，其事一般是據朱熹『通鑑綱目』之記載而謂始於大業二年，或泛言大業年間（註二）。資料不足是治史者最大的缺憾，惟李唐一代制度之美備，實奠基於楊隋，如何由有限的資料去窺知楊隋一代的制度及其實際的推展，則為治史者所不可忽視的問題。此其一。隋代的建立，結束將近四百年的大分裂（茲由西元一八四年黃巾之亂計起），其建制充分顯示承先啓後之特質，如何從歷史之變當中去肯定常，如何從歷史之常當中發現變，教育與貢舉當是值得注目的因素之一。例如隋將國子寺罷隸太常寺之統轄，這是歷史之變；而國子寺制之建置，則又集漢、（元）魏、（北）齊制之大成，這是歷史之常；又如貢舉諸科的成立，實是集漢以來選舉制之大成，此為常，但由選舉演變為考試，乃至進士科的創立，則為變；凡此因素，在歷史的洪流中，如何予以適當解釋，尤其在隋代中央集權政策下，學校及貢舉的新發展，與廢九品官人法、鄉官等有何關連，均是重要課題。此其二。甚至學校的興廢與貢舉之間的關係，亦密不可分，此中牽涉文帝、煬帝的教育觀以及當時之學風，實有待深入的探討。此其三。這些課題，在目前前的學術作品中，其作某些特定問題的探討則有之，作通盤性的檢討似尚缺乏，拙稿乃嘗試提出解答。

一 教育制度的建立

拙文所稱的教育，是特指官學教育而言；所謂教育制度的建立，也就是指官學教育體系的建立。我國官學教育的發展，從漢以後到隋

代初次完成獨立的教育行政體系，這就是將國子寺罷隸太常寺而直屬於尚書省禮部。國子寺之下統有國子、太學、四門、書、算等五學，另外在大理寺、太醫署、太僕寺、太卜署、太史曹、掖庭局等機構也設有教學場所，地方的州、縣並設有學館。據此而言，隋代初期的教育制度，是以國子寺作為最高教育行政機構，在中央分設直系諸學館（指隸於國子寺）與旁系諸學館（指不隸於國子寺），地方則有州、縣諸學館。地方州、縣學詳情不明，茲將中央官學組織列表於下。

表一、教育行政官署

國子寺 祭酒一人（司業一人）
 從三品（大業三年置）
 從四品（丞三人）
 從六品（大業三年置）

主簿一人（從七品？）
 錄事一人（從九品？）
 人（隋書卷二八百官志）

表二 直系學館

國子寺		太學		四門學		書學		算學	
學館別	員額	學館別	員額	學館別	員額	學館別	員額	學館別	員額
國子學	正五品上	國子學	從七品	國子學	正五品上	國子學	從七品	國子學	正五品上
博士	五	博士	五	博士	五	博士	五	博士	五
助	五	助	五	助	五	助	五	助	五
教	從七品	教	從七品	教	從七品	教	從七品	教	從七品
學生	一四〇	學生	三六〇	學生	三六〇	學生	三六〇	學生	三六〇
員額	一四〇	員額	三六〇	員額	三六〇	員額	三六〇	員額	三六〇
典	同	典	同	典	同	典	同	典	同
據	同	據	同	據	同	據	同	據	同